

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与再教育

乌塔·格哈特
(Uta Gerhardt)

内容提要 二战后美国占领政权通过历史反思与再教育实现了西德民主的再造。其中历史反思主要包括: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而再教育则通过黑、白名单的制定,彻底结束了德国人认知当中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对文化政策的提前计划与政策准备。它们使德国人意识到,宽容和责任意识对于民主制度是多么重要。

关键词 二战 历史反思 再教育 国家社会主义 白名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盟军的胜利结束后,德国的主权由盟军的控制委员会行使。控制委员会的任务就是通过恰当的占领政策来保证将来德国不会再次发起世界大战。尚属盟国的美英苏“三巨头”在1945年2月于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和1945年七八月间在柏林郊外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共同确定了占领统治的前提条件,即确保在占领区消灭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占领区在推行反法西斯政策的同时还计划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一个统一的政党来统治,并实行计划经济。而另外三个西方占领区(在美国和英国以外,增加了法国作为占领政权),则计划向由分权、议会政治和市场经济主宰的现代民主制度过渡。

本文研究的是美国的占领统治时期。美国的占领统治历经多年准备,其把联邦德国从国家社会主义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的理念对于另外两个西方占领政权而言同样具有榜样作用。^①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研究对象,有两个理由:第一,早在1945年到1948年间,英法占领政权就已经在他们的占领统治实践中极力模仿美国人预先设定的政策了;第二,这个最初的美式理念,在三个西方占领政权的统治区域都是有权威性的。对旧的纳粹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重塑的理念,自

^① 有关这一理念的历史与形式,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Robert Wolfe (Hg.) *Americans as Proconcul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4 - 1952*,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1971; Earl F. Ziemke *The U. S. Army in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 1944 - 1946*, Washington 1975; Hermann-Josef Rupieper *Die Wurzeln der westdeutschen Nachkriegsdemokratie. Der amerikanische Beitrag 1945 - 1952*, Opladen 1993; Michael Beschloss *The Conquerors: Roosevelt, 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 1941 - 1945*, New York 2002; Uta Gerhardt *Soziologie der Stunde Null. Zur Gesellschaftskonzeption des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regimes in Deutschland 1944 - 1945/1946*, Frankfurt am Main 2005.

1948年夏初进行的货币改革开始就主导了三区(行政和经济管理实现统一的三个西方占领区)的政策。到1949年夏秋之交联邦德国建立之时,这个理念的权威性更加突出。

为了实现以民主取代专制,美国占领政权主要致力于以下两项任务:第一,重新塑造德国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第二,把德国人成功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公民。第一项任务计划建构或再造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并且在该过程中争取与魏玛共和国的某些部分联系起来。民主社会应当取代已成为历史的纳粹专制,而且战后德国的新政权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包含德国传统历史上的结构。第二项任务要求德国人的思想发生转变,在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与符合人性的价值之间应该构建一条通路,宽容和责任感应当重新成为基础——这是法治国家的基石。笔者以“历史反思”为标题来阐释第一项任务,对于第二项任务则使用“再教育”的标题。

本文想指出的是“历史反思”战胜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统治,美国占领政权通过采取措施实现了西德民主的再造。“再教育”结束了德国人认知当中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而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对文化政策的提前计划与政策准备。它们使(后来的)联邦德国公民意识到,宽容和责任意识对于民主制度是多么重要。

历史反思的举措和方案

有关第一项任务,即历史反思的举措在22份计划文书中得到了详细阐释,其中有些计划长达数百页:包括1944年12月生效的《德国军政府手册》(Handbook of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有1200多个章节,以下简称《手册》)和1944年9月制定的总参谋部指示方针《德国军政府指示方针》(Directive Regarding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ermany,以下简称《指示方针》)。它们逐一解释了占领统治应如何通过允许和禁止来处置国家社会主义,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通往民主制度的转型。这些涉及广泛的措施的目的即在于消灭国家和社会领域中的国家社会主义。

此处笔者将进一步阐释的是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这四个方面的措施。^①目的在于通过举例来说明历史上为战胜国家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历史反思所发挥的作用。具体包括:为了让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为未来设置转折点,所有社会领域在德国公共生活被归零期间都被重塑;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罪犯;通过两个阶段对全体德国人实施去纳粹化,尽可能地要他们为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过去而赎罪;欧洲复兴计划(ERP,即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使得联邦德国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一) 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

根据美国占领军在各占领区发布的第一号公告,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都移交给了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和军政府首脑。从而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其一,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被废止,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运转的所有机构,尤其是政治、司法和教育领域的机构都被关闭;其二,全体德国人需要无条件服从军事机构的命令。军政府的基层派出机构迅速成立,并且在具体行动中贯彻《手册》和《指示方针》的规定,从而为新的结构创造了起点。这些规定涉及以下20个社会领域:行政机构、司法、教育事业与宗教、公共安全(包括警察在内)、财政部门(包括银行和用于“冻结”国家社会主义的账户和财产的新式信托公司)、公共卫生事业和福利机构、负责照料数以百万计从家乡被驱逐出来的人口和获释的战俘以及从前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的机构、管理食品、农业和经济(包括

^① 四项措施在西方被概括为“4D's”,即Denazification(去纳粹化),Demilitarization(去军事化),Decentralization(去中央化),Decartelization(去垄断化)。

城市供给企业(在内)的机构、劳动市场(包括劳动力和工会在内)、邮政·通讯·广播电台系统、交通事业及博物馆与档案馆等。《手册》和《指示方针》为这些领域制定了规则,并且即刻要在实践中加以贯彻。

为了去纳粹化,军政府采取了四项措施。全部行政机关、银行、企业、教育机构等都要关闭或中止运转,而党卫军、盖世太保和所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成部门立即被取缔,集中营也被废除。“肃清工作”涉及的司法、警察这类机构,应当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后重新开启或继续运转,并由与国家社会主义没有瓜葛的人员来管理。控制监督委员会首先考虑的是行政和供给部门,因为它们与公共生活息息相关,比如食品机构。它们应当在不中断的情况下(偶尔也会短期关闭)肃清具有国家社会主义背景的人员,根据军政府的指示继续运转。

在关闭和中止运转这段时期内,所有生活领域和机构都要确保实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具体说来:第一,通过去纳粹化,所有具有国家社会主义背景并曾担任公职的人都被没有国家社会主义“污点”的新人取代。为保证此事顺利进行,军政府设有专门的“反情报部队”(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负责审查。第二,去军事化不仅剥夺了武装力量的权力,销毁了他们的武器,而且还要取缔所有机构中的军事要素。第三,通过去中央化,废除德国的中央集权结构,基层统治单位(乡镇、地方法院、大学等)作为最基层的(和第一批被重启的)社会领域承担了至关重要的功能。第四,通过去垄断化,废除所有的垄断集团,分解大工业的巨型公司,在经济领域的生产贸易中形成一个由新建的、最大程度去中央化的公司所构成的网络。

早在1943年12月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文件《美国处理德国问题草案》(U. S. Proposal for the Treatment of Germany)就以“民主政府”为题,为可预见的战后德国民主化勾勒出前景:“根据盟军的预先设定,在停火之后对德国实行军管是可以预见的,因此在这段时期内必须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应该尽可能快地建立起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通过集会自由建立与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全然无关的政党、文化协会以及工会。”^①

(二) 纽伦堡军事法庭

早在1943年11月盟军就为以下原则达成一致:德国人要为他们的罪行在他们犯罪的国家接受审判;对于那些罪行涉及若干国家的罪犯,则应设立国际军事法庭。针对22名被告人(均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的法律程序于1945年11月1日至1946年10月20日在纽伦堡进行。控方和法官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他们通过历史上首次独一无二的论证和解释,发展并制定出一套用于判决的法律基础,即针对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进行诉讼。控诉不仅仅针对个人,同样也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体和组织,最终作为政治领导组织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包括保安服务处(SD)在内的党卫军(SS),以及涵盖其全体干部与成员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等四个组织被判定为有罪。

论证过程乃是依据数以千计的文件,它们可以为国家社会主义机构人员的犯罪性指令与行为作证。^②已成为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在1933年至1945年间犯下的史无前例的罪行由此得到

^① Joint Chiefs of Staff, United States Proposal for the Treatment of Germany, 18 December 1943 905 - 1 (J. C. S. 623).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I (College Park), Record Group 218, Joint Chiefs of Staff, Geographic File 1942 - 1945, CCS 387 Germany, Section I.

^② 参见战后阶段的文献资料集 N. N., *Design for Aggression. The Inside Story of Hitler's War Plan*, New York 1946; N. N., *The Nuremberg Documents. Some Aspects of German War Policy, 1937 - 45*, London 1946; 德译本: Peter de Mendelssohn, *Die Nürnberger Dokumente. Studien zur deutschen Kriegspolitik 1937 - 45*, Hamburg 1947.

证实,并成为宣判的基础。^①“破坏和平罪”意为“策划、准备、发起或者实施侵略战争或者损害国际条约、协议或承诺的战争”;“战争罪”意为“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例如)对被占领土上的平民居民实施谋杀、虐待或驱逐至劳改营进行强制劳动,谋杀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劫掠公私财产,或无军事之必要而以非正义方式进行破坏”;“反人道罪”意为“对平民进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和其他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种族、宗教背景的迫害”。

在针对主要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结束之后,到1949年为止,在纽伦堡又后续进行了12次大规模的法律诉讼,把有犯罪行为的医生、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的司法人员、党卫军的主要经济和行政机关、克虏伯康采恩、弗里克康采恩、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党卫军行动队、外交部以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送上了法庭。

此外,还有在过去的达豪集中营举行的司法审判持续到1950年。这些针对犯人和机构的法律程序,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是把法治国家的原则运用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阶层所犯下的罪行之上,这些统治阶层把持了国家大权,并把人们变成牺牲品和罪犯。正如美国首席检察官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在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之际所说的那样“若是广大的德国人民群众欣然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纲领的话,冲锋队就不是必需的了,集中营和盖世太保也不需要了。”^②

(三) 去纳粹化

去纳粹化经过了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在美国的总指挥之下进行的。第一阶段的目的在于清除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第二阶段则致力于推动每个单独的德国人在国家社会主义之后走向新的起点。^③

去纳粹化是《手册》的主要议题,其第二部分通过长长的名单和表格罗列了纳粹系统的序列和分类,目的是统计所有任职人员。为了实现去纳粹化,这些人从各自的岗位上被解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拘禁起来以审查他们的犯罪行为。对组织的清理应当保证只有属于“无条件接受”类(unconditional acceptance)的人员才能在公共部门(自1945年9月起也包括经济部门)拥有或得到职务。“无条件接受”类的人员无疑是指那些1945年前遭到迫害或者被驱逐出他们从前生活领域的人。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类别是“无条件解雇”(unconditional dismissal),指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所有这些人都会被解雇且不可聘用。另外还有一个类别叫作“有条件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与“有条件解雇”(conditional dismissal),这一分类适用于具体情况不清楚的人,对他们保留了重新审查的可能性。如果在后期发现他们与国家社会主义有关联,就会开除他们。地方军政府的公共安全部门(Public Safety Branches)和特殊部门(Special Branches)必须与反情报部队(CIC)合作,以保证有国家社会主义污点的人不会在新成立的德国行政机关、大学等单位任职。职业世界是战后德国的主要社会领域,有国家社会主义污点的人要尽可能的排除在外,以避免他们对新的起点进行干扰或破坏。

1945年12月以后,二战后成立的美德委员会在军政府的法律顾问、前司法部长费伊(Fahy)的

^① 判决书载于(根据原文缩写): Joe J. Heydecker, Johannes Leeb, *Der Nürnberger Prozeß. Bilanz der tausend Jahre*, Frankfurt am Main 1958, 549.

^② Joe J. Heydecker, Johannes Leeb, *Der Nürnberger Prozeß. Bilanz der tausend Jahre*, Frankfurt am Main 1958, 7.

^③ 有关去纳粹化的两个阶段(1944年9月—1946年6月,1946年3月—1951年)以及清算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条准则(与前者是分开的,即运用刑罚,例如纽伦堡军事法庭完成的工作,德国法庭至1949年举行的审判,还有自1958年起在驻路德维希堡的各州司法管理总署领导下为追查国家社会主义罪行而采取的法律行动)详见 Uta Gerhardt, Gösta Gantner, *Ritual Prozeß. Entnazifizierung. Eine These zur gesellschaftlichen Transformation der Nachkriegszeit*, Forum Ritualdynamik No. 7 (ganzes Heft), SFB 619 “Ritualdynamik” der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Heidelberg Juli 2004.

领导下 拟定对程序实行改变和扩大 对象涵盖所有德国人。从那时起 每个德国成年人都被要求接受去纳粹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是以法律形式进行。根据《清除国家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法》(1946年3月通过) 所有的城市都设立了法庭 由一名法官担任主席。这些法庭负责按照五个类别审判那些尚未通过公诉得到审理澄清的案件。根据这一划分 最高层级是主要罪犯 (major offender) 等待他们的是严厉的制裁; 最低层级是免除罪责 (exonerated) 他们被认定没有任何犯罪行为。^① 这些措施针对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告密者以及参与或协助实施犯罪的人员——也就是说 那些配合纳粹政权对受害者进行劫掠和迫害的人也包括在内。主要罪犯和一般罪犯被处以长期监禁或职业禁令。对于罪责较轻者 (minor offenders) 和追随者 (followers) 则主要判处金钱赔偿。对于法庭做出的决定 特殊部门 (Special Branches) 可以提出异议 而且原则上也允许德国方面提起上诉。截至1949年 去纳粹化牵涉的德国人数量接近两千万。这一程序强迫他们公开阐述自己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自己与该犯罪政权曾经的瓜葛而接受惩处。这一程序的特别之处在于 每一个德国人都被牵扯进来。错误的声明或者因为自己有明显污点而耽误自己的去纳粹化进程 都会受到惩罚 (这个由军政府的法庭负责)。因此 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初 没有一个德国人能够继续以“老纳粹”的身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职位。

(四) 欧洲复兴计划

随着1946年形势的发展 苏联的意图已经显而易见 它并不打算在战后实行民主化 而是植入了斯大林主义路线。苏联还把社会主义专制强行植入到中东欧国家。这促使美国决定 在已经开始的冷战和东西方冲突中通过重建援助的方式确保西德和西南欧国家的民主制度。重建援助的目的在于发展经济并相应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以美国外长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计划为16个欧洲国家提供了财政支持。这就意味着要承认货币的可兑换性与国家财政的透明度 并且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论坛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OEEC)。自1948年起 西德 (更确切地说是三个西方占领区) 在筹建联邦德国的过程中获得了建设援助 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却因为莫斯科的命令没能参与计划。^②

从那时起 历史反思就体现在经济转型中。军政府从1945年开始就通过有目的地控制经济 支持并建立起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仅从事民用生产的工业。这个与欧洲市场紧密结合的经济体对于正在形成的欧洲民主机制不但不构成任何威胁 而且正相反 它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支柱 当时的西德即体现了这一点。^③

(五) 总结

四条历史反思的准则通过驾驭社会转型为战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 (国家和社会) 开拓了新起点。

在“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当中 对德国实行去军事化是起始点 它剥夺武装力量的权力 解散军队 销毁武器并取缔了军国主义。去中央化意味着新建立起的地方力量拥有优先权 这就使单个行政部门和企业等具备了可控性。去纳粹化保证了所有机构中不再有 (从前的) 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任职 这就使得纳粹政权的延续成为不可能。去垄断化废除了大工业 并强迫它们以市场为导向为出口从事生产。

^① Johannes Priese, Karl Prokorny, *Kommentar zum 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 nebst Ausführungsbestimmungen,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en, Nebengesetzen, einem Schlagwortregister und Organisationstabellen*, Frankfurt am Main, Bde. I – III, 1946 bis 1948.

^② 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 – 1952*, Cambridge 1987.

^③ Christoph Buchheim, *Die Wiedereingliederung Westdeutschlands in die Weltwirtschaft 1945 – 1958*, München 1990.

纽伦堡军事法庭实现了对纳粹国家及其官僚和组织的刑事责任追究,完成了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法创举,其目的在于保护平民与和平的国家。

去纳粹化与军事法庭是相对应的,它把所有德国人都纳入到赎罪的程序中,并为每个公民规定了权利和义务:即在联邦德国正在形成的民主机制中,作为一名国家公民和经济主体亲身积极参与。

马歇尔计划使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并永久性地挫败了那种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运行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模式,从而使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德国不可能重现。

再教育的文化理念

再教育(Reeducation)意味着德国文化重心的全新转向,它作为一个文化理念被首次提出是在一部1943年出版的政治精神病学著作中,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该书认为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具有犯罪性质的种族主义特征,其世界观带有明显的妄想性,因此需要制定一项政策来帮助治疗德国人的偏执狂。该政策参考了当时现代精神病学采用的名为再教育的治疗手段,医生通过病人人格中“健康的部分”(clear areas)来进行治疗,在患者的积极配合下,医生可以逐渐加强“健康的部分”,从而限制甚至消除那些不良干扰。^①通过转化应用这一理念,可以成功实现民主文化在德国的再生。在充满妄想的种族主义残酷地摧毁了德国人的全部文明之后,再教育能够使得文明的德意志民族性重获新生,未来将不会滥用暴力。

再教育的文化理念可以用四点来进一步说明:美国副总统曾在1942年底发表过有关对德国(和日本)进行再教育的演讲,但当时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政治理念。“战后德国”(Germany After the War)会议起草了有关精神文化重心转向的思想,其中包含“健康的”经济结构,以强化绩效与首创精神为导向。“白名单”(White List)是战后政策的起点,用150页列举出没有国家社会主义污点的德国人姓名;还有为波茨坦会议的召开而制定的《德国再教育政策声明》(Policy Statement on German Reeducation),它是《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Long-Range Policy Statement on German Reeducation)的前身,自1946年夏天起成为官方文化政策,推动着德国的美国占领区的民主化。

(一) 副总统的广播演讲

1942年与1943年之交,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一次广播演讲中提出了美国的政策目标,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以民主制度为目标,确保完成对德国和日本人民的清除教育和再教育。对于欧洲来说,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德国人彻底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必须学会战胜一个世纪以来占据他们头脑的信条,即他们属于一个统治种族。德国人民必须学会忘记一切,既有希特勒教给他们的一切,还有在他以前数百年间的众多哲学家和导师教给他们的铁血理念。美国必须把军事层面的非武装化继续扩展到心理层面的非武装化。”^②

(二) “战后德国”会议

1944年夏初,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布里克纳(Richard Brickner)邀请相关人士(以医务工作者为主)参加了“战后德国”会议。会议议程涵盖了占领统治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会遇到的问题,其中

^① Richard Brickner *Is Germany Incurable?* Philadelphia 1943.

^② 演讲摘自 Edward O. Mowrer,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in Making and Keeping the Pea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1943, 174-182.

特别考虑到德国人的民族性。^①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解释说,德国人既是多愁善感的,又是等级森严的,同时可以做到既友好又残暴。这就要求占领计划必须首先考虑到德国人的矛盾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胸中有两个灵魂”。米德用德国家庭的传统结构来解释这种矛盾性:父亲是专制而不可接近的,母亲则是柔弱而富有同情心的,她在孩子面临父亲的惩罚时没有能力上前保护。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指出,要想引导德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转型,就必须同时改变其民族性。而且,如果德国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在精神文化层面完成对新形式的适应,才是最有意义的。民族性和体制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德国人可能酿成严重后果的民族性格可以通过教育措施获得改变。会议报告在导论中专门强调“这里刻画的德国人特性不是遗传的,而是通过教育习得的。体制在一切文明中都可以塑造性格,个人在体制内寻求自我实现。所谓体制,我们指的是传统的行为方式、语言、信仰和感情。历史上它们塑造了每个群体,目的在于创建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并克服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体制塑造了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反过来巩固了体制的延续。”^②尽管人们知道,并不存在再教育的王道,会议报告(1944年11月)仍然致力于做出清晰的说明,例如占领统治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德国人精神文化层面的社会心理转变。无论如何,以下关于德意志民族性的传统神话都不能再进入德国人的头脑了,报告还建议,要用更为恰当的思想观念来取代以下这类思想遗产:“1. 德国人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可战胜的……3. 瓦格纳歌剧所赞颂的至纯至强者可以成就一个全新的种族,比全体人类或神灵都要完美……5. 社会要由最高形式的完美所统治,它完全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组织得井井有条,每一个人都坚守在他固定的位置上。”^③

(三) “白名单”(White List)

为筹备德国的战后重建,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就制定了两份名单。一份列举了反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人士,他们曾经遭受迫害,有些参加了反国家社会主义的抵抗运动。另一份名单则统计出了有国家社会主义污点的人,他们在战后被束之高阁。后者即“黑名单”,作用是把不合适的德国人排除在外;而前者即“白名单”,作用是为新的起点寻找合适的德国人。

“白名单”是由“心理战分队”(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这一军事单位为筹备战后德国的民事管理而制定的。^④这份文件统计了反纳粹或非纳粹人士,特别富有启发意义。“白名单”上大约有1300条记录(分八个地区),按姓名、地址、职业以及被认定为反国家社会主义的理由(被纳粹政权解雇、帮助受迫害者、持反政府态度以及由一名可靠的移民推荐等等)顺序罗列。比如名单中提到了科隆的罗伯特·格罗舍(Robert Grosche):“布吕尔附近的罗赫(Vochem nr. Bruehl, 地址)牧师,曾是科隆大学的学生精神指导,积极的反纳粹人士,中央党左翼。”格罗舍

^① 上百页的会议报告主要由七份附录构成,阐述了计划中的占领政策,内容涉及德国民主化的诸多议题“Psycho-cultural Approach”, “Regularities in German National Character”, “The Problem of Controlled Institutional Change”, “Short Term Proced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Germany(Direct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The Problem of the Management of Germany, in the Light of Motivations Dominant in a Democracy”, “Possible Re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eople”以及“Long-Term Proced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Germany(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Peace)”。In: N. N.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Germany After the War*, 194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Widener Library)。

^② N. N.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Germany After the War*, 1944. Abstract of the Proceedings J.

^③ N. N.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Germany After the War*, 1944. Appendix 7: Long-Term Proced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Germany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Peace) A.

^④ N. N. ,The White List. PWD “White List” of Persons in Germany Believed To Be Anti-Nazi or Non-Nazi. 5 December 1944. 以微缩胶片形式保存在联邦档案馆,可供查阅,编号为5/247-2/19, RG 260/OMGUS.

在1945年3月就已成为科隆的大主教,并很快由教皇推举为红衣主教。总的来说,“白名单”罗列的大部分人来自媒体行业(报刊、广播电台、出版社编辑、出版业者)。还有一些人士来自行政管理、经济界、学术界等等,或者就是从前的政治家。比如名单对符腾堡的大学教师、记者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①有如下记录“地址不详,约60岁,新教徒,1924年至1928年、1930年至1933年间任帝国议会议员,自由作家,毫不妥协的民主主义者。尚不清楚他是否愿意合作,但我们应该试试。”

并非“白名单”上的所有人士都经历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完结,而且可以被争取来完成重建任务。例如恩斯特·冯·哈纳克(Ernst von Harnack),他是以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为中心的抵抗运动成员,1942年遭到盖世太保和人民法庭的迫害身亡。还有来自施塔恩贝格的抵抗组织成员,为他们的信念付出了生命。其中就有“库尔特·瓦根塞尔(Kurt Wagenseil),英语小说翻译,极其有教养,对盟军的态度极其正面……库尔特被投入集中营,并被迫观看他的一名挚友遭受鞭笞。此人因残酷的殴打死在了瓦根塞尔的眼前。”

(四)《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

1945年初,负责媒体和文化政策的美国副国务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cLeish)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国务院的德国问题专家、各大学校长以及有移民背景的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组成。该工作组着眼于战后德国的状况而制定了备忘录《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作为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官方文件之一。^②

备忘录首先指出,为了使德国得到彻底的改造,军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具体说来,经济和社会结构需要完全重建,文化生活也要彻底重塑。“德国要通过接受占领走向自治,其国民要对国家负起责任,德国不能再度成为一个剥夺公民责任的集权国家。”接着对此进行了解释。“人性和正义是主要价值,它们必须在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重新得到普遍认同。”这的确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对德国民众进行政治和道德领域的再教育,目的在于重建与正义相关的普世价值”。备忘录第三部分“政策声明”阐释了这些必须重建的价值,从五方面说明了民主的思想财富,是德国人必须学习的:第一,国家之间存在双边义务,一国不得奴役他国;第二,个人的尊严与完整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这不仅仅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个人贬损为国家的工具;第三,全体公民对国家与社会都负有责任,每个个体在参与国家事务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该权利需要得到国家的保障;第四,真相(即真理与真实性)对法治国家的运行至关重要,这是对横行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欺骗与压迫的否定;第五,在一国内部推行文化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宽容对于民主制度意义重大,与此相对的是,强制推行文化统一是暴政和无政府状态的标志。

上述“有关正义的普世价值”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们构成了《德国再教育政策声明》的核心,在1946年成为被占领德国(美国占领区)官方文化政策的主题。负责主持德国文化重建与社会民主化的是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tate-War-Navy-Coordinating Committee, SWNCC)。该委员会实行跨部门合作,除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还涉及财政部。它以《德国再教育政策声明》

^① 特奥多尔·豪斯后来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② 备忘录是波茨坦会议官方资料中的第343号文件: N. 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 I, No. 343, Washington 1960, 482-487. 备忘录的日期为1945年7月4日,带有标记“Top Secret”。

作为指示方针,对其略加修订后更名为《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①

这份由七部分构成的文书规定:1. 国家的文化道德再教育必须为德国成为和平稳定的经济体创造可能性,还要预先考虑到德国人的自尊心与国家统一的再度实现……6. 这一政策只有在不断激活德国文化传统的情况下才能算作成功,目的在于确保新理念和新机制的产生不涉及暴力;7. 持续的文化转型要靠德国人自己。清除国家社会主义残余之后,应当把再教育的主导权逐渐移交给那些能够担起责任的德国人。换句话说,《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把对德国人的文化与道德净化当作核心支点,旨在消灭国家社会主义富有侵略性和专制性的世界观,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与现代国家和社会相适应的世界观——宽容与民主。另外,该声明还指出法治应占据主导,由此和平的市场经济才得以形成与发展。

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方针指南 SWNCC 269 的附加文件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为德国的文化转型所提供的帮助: SWNCC 269/8 发起了国际文化交流项目,至今仍在以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Programm)的名义继续运作; SWNCC 269/9 为青少年儿童创造了不被强制完全自愿参加业余俱乐部和体育协会的机会,参与者达上百万; SWNCC 269/10 允许政治媒体在德国重新出版,信息资料可以不经审查或批准,直接进口;与此同时,1946 年还成立了美国信息中心(American Information Centers),自 1948 年更名为美国之家,它以信息自由为原则,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得到人们的广泛运用。

(五) 总结

再教育的四项课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加强“健康的部分”,就是要强化德国人(和日本人)思想行为中那些与国家社会主义无关的部分。美国占领政权的计划和政策就是以此为目标。

1942—1943 年之交,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广播演讲中提出了清除教育和再教育。他指出,要通过思想转型的重大任务消除德国人的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

“战后德国”会议把“加强健康部分”视为消除德国民族性矛盾的前提条件,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把理性民主作为唯一的导向。另外应当废除德意志民族性当中的军国主义传统与价值观念,取而代之以个人主义和平民文化,并让它们占据主导。

“白名单”是实用有效的政策,它在已成为废墟的战败国的上百万人口中找到了数量有限的人才,可以确信他们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能够为民主制度的开端肩负起国家与社会中最为重大的责任(在占领政权控制下)。国家社会主义时期遭受迫害的人士就这样转变为战后时期民主化的先行者。

包括《德国再教育政策声明》在内的《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确立了有关正义的五项价值——即平等、自由、国家公民责任、真理与真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法治国家因此成为“加强健康部分”的核心支点。

历史反思与再教育之间的桥梁

在过去的 20 年里,德国和美国就历史反思产生了一个讨论,该讨论超越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既

^①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353 (Inter- and Intradepartmental Committees), Entry 501, SWNCC Records of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Status Reports, Jan. 1946 – Apr. 1949. 其他资料以微缩胶片形式保存在 National Archives, 可供查阅, 编号为 M 57, Rolle 24.

往研究,涉及历史反思的另一个维度,即把目光投射到有关第三帝国的回忆问题上。^①1959年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曾做过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题目是《清理过去意味着什么》,其论述便是该维度的依据。^②战后连续15年,阿多诺一直在向德国人呼吁:对可怕的事实既不要否认,也不要事后用显然站不住脚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

本文没有采用对历史反思的上述解释。在对战后德国民主化的两条线索进行的历史回顾中还存在另一维度——政策措施层面的“历史反思”(确保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的覆灭无可挽回)以及“再教育”(以德国人在国家和社会领域的再文明化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反思”主要标志着专制的结束,这对于体制(必须重新产生或接受民主改造)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再教育”意味着通向民主的过渡,其中文化心理因素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德国人的思想和世界观必须(重新)与民主国家相适应。

本文所描述的“历史反思”与“再教育”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由此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战后德国民主化所蕴含的逻辑。“历史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向民主制度过渡的消极一面,“再教育”则相应构成了1944年至1949年间所有社会历史事件的积极一面。德国转型的两条线索都是由(美国)占领政权牵引的,应当被视作同一历史进程的两面。这完全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冒险:把犯罪性质的专制政权转变为长久和平的民主政体。战胜国出于信念为自己制定了任务,即作为占领政权把战败国重新塑造成一个现代国家(三个西方战胜国共同承担了这一任务)。这种冒险在7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让人感到勇气非凡!

今天人们还可以提出这个问题:这种走钢丝式的跨国跨文化传播(其实是从地球的一端传向另一端)究竟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人们还可以这样提问:这个“民主奇迹”^③是如何变成现实的?德国精英在过去至少二百年间一直为侵略性的军国主义摇旗呐喊;当德国在二战中失败后,他们不仅接受了军事被取缔、国家体系被长期摧毁的事实,而且被迫按照去纳粹化政策的要求,公开交代他们的国家社会主义经历,这是何等耻辱。人们还可以把同样的问题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个“经济奇迹”是如何变成现实的?德国大企业家自19世纪就建立起一系列足以主宰市场的垄断集团,由它们构成的帝国即使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仍然部分存续;如今德国灭亡了,全部经济基础设施都被摧毁,而且去垄断化政策永久性地斩断了其与战前结构的所有联系,对此他们未加抵抗便接受了。

要回答以上问题,通过对德国战败前历史的回顾,或许能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提示。美国的政策自1943年1月起(此时斯大林格勒战役仍在进行)就确定了坚定的战争目标,即迫使大德意志帝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最终得到了盟国英国和苏联的追随。

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共同确定了战略,他在1943年2月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如此阐述道:“我们要用毫不妥协的行动让那些有罪的野蛮领袖受到公正的惩罚,还要追究他们对战争的全部责任。”^④同一时期,战争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在一份发给

^① 参见 Jeffrey Alexander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A Debate*, New York 2009; Aleida Assmann, Juliane Bauer, *Bilder, Gefühle, Erwartungen. Über die emotionale Dimension von Gedenkstätten und den Umgang von Jugendlichen mit dem Holocaust*,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Bd. 37, 2011, 72-103.

^② Theodor W. Adorno, *Was bedeutet: 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0.2 -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I*, Frankfurt am Main 1977, 555-572.

^③ 参见 Arnd Bauerkämper, Konrad H. Jarausch, Marcus M. Payk (Hg.) *Demokratiewunder. Transatlantische Mittler und die kulturelle Öffnung Westdeutschlands 1945-1970*, Göttingen 2005; 另见 Uta Gerhardt *Denken der Demokratie. Die Soziologie im atlantischen Transfer des Besatzungsregimes. Vier Abhandlungen*, Stuttgart 2007.

^④ 转引自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II, London 1948, 1571. (Hull 担任美国国务卿至1944年11月)。

联合参谋总部的备忘录中解释道“长远的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如果(德国人)要把战争引向苦涩的结局,我们就通过占领措施给他们上一课。他们会明白,不断试图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终究对他们是划不来的。”所以,德国要为它自己的不幸和沉沦承担罪责。^①通过无条件投降,德国人应当清清楚楚地认识到,除非德国从今往后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否则就不会在世界面前获得任何宽恕。罗斯福在1944年5月给丘吉尔的一封电报中如此写道“盟军会消灭追求世界霸权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当中的每条教义……德国和日本犯了一个可怕的灾难性错误。德国和日本必须为它们所造成的毫无意义的生命和财产毁灭进行真诚的谢罪,并将为此受到惩罚。”^②换句话说,无条件投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瓦解了德国的国家体系,这既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机会——利用这一机会,过去的所有遗迹将尽可能地得到清除;大工业被摧毁,并且被迫以竞争和出口为目标从事生产;传统的社会精英在沉沦与过渡的漩涡中丧失了影响,丢弃了狂妄——德国历经过渡重获新生。

(作者乌塔·格哈特,原海德堡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译者陈琛,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问世

邓野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9月出版 29万字 38元

邓野著《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重点探讨了巴黎和会时期中国的外交交涉与政派利益分歧,强调巴黎和会对于北京政府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外交与内政更是纠缠不清,相互影响。如当年强烈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之荣耀。作为张勋复辟主谋之一的康有为,公然主张推翻民国,却在巴黎和会期间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尤其是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境地。该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巴黎和会时期北京政府内外博弈的复杂面相。(徐志民)

^① 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Churchill). 740. 0011 European War 1939/5 - 1844: Telegram. Document 541, in: N. 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4, vol. I, Washington 1966 514.

^② War Department,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25 February 1944,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paraphrased J. J. McC). National Archives, RG 218, Joint Chiefs of Staff, Geographic File, 1942 - 1945, CCS 387 Germany, Section 2.